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
1999 年 6 月，頁 301-336

BIBLID1012-8514(1999)23p.301-336

考古學上所見秦帝國的形成與統一*

徐 蘋 芳**

提 要

考古學上所見最早的秦文化遺存是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在甘肅的天水、禮縣和陝西的寶雞，屢次發現秦遺物，證明秦從甘肅東部逐漸向東遷移。公元前 677 年遷都雍城（今陝西鳳翔），公元前 383 年再遷都櫟陽（今陝西臨潼），雍城遺址和雍城南面的秦公陵園，櫟陽城遺址和其附近的秦東陵，都做過考古發掘，對秦文化的形成發展了明確的認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王朝。最能代表秦文化的咸陽宮和「碣石宮」遺址，規模巨大的秦始皇陵園和秦兵馬俑坑，以及分布於甘肅、寧夏、陝西、內蒙古、河北、遼寧各省的秦長城遺跡，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調查和研究，都獲得了新的成果。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秦祚短暫，考古學上證明秦統一的事業是到漢武帝時才逐步完成的。

關鍵詞：甘谷毛家坪　雍城　咸陽宮　秦始皇陵　秦長城

* 本文是作者與張光直先生主編的《中國文明的形成》一書的第八章，該書將分別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文本。現特先行發表，以饗讀者。關於秦簡中所記的秦社會歷史和法律諸問題，本文未涉及，當另文論之。

** 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現擔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秦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二、秦始皇統一
三、漢武帝完成秦統一大業

一、秦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事業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不論做出多麼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在列國爭雄的時代，秦偏處西陲而能奮起東進，統一全國，令人矚目。因此，關於秦文化的起源與發展，便成了中國史學界關心研究的課題。

（一）甘谷毛家坪秦文化遺存的發現

在中國歷史學界關於秦文化的起源（實際上也是關於秦人的起源）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爲秦起源於東方，秦人從東向西至甘肅東部，然後再從西向東而統一中國，這是從《史記》以來的傳統說法；另一種意見認爲，秦起源於西方，與西戎有密切關係，王國維首創此說，[1]蒙文通繼之。[2]

從考古學上來看，秦人之遷徙和秦文化之形成，雖然有密切之關係，但秦人與秦文化畢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考古學所涉及的主要是秦文化的問題，因此，甘肅毛家坪秦文化遺存的發現是很重要的。

毛家坪遺址位於甘肅甘谷縣盤安鄉，1982～1983年正式發掘。發現了周秦文化遺存（被稱爲A組遺存），有遺址也有墓葬，陶器以鬲、盆、豆、罐爲組合，前期的時代可到西周中晚期，後期爲春秋早期至戰國早期。墓葬爲土坑豎穴墓，葬式幾乎全部都是屈肢葬。[3]毛家坪秦遺存有濃厚的周文化因素，而與其後的關中秦文化有直接關係。這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秦文化

1 王國維，〈秦都邑考〉，《觀堂集林》（北京：中華，1959），卷12，80。

2 蒙文通，〈秦爲戎族考〉（原載《禹貢》6卷7期），收入《周秦少數民族研究》，見《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3.4），72～76。

3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系，〈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年3期（北京），3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遺存。[4]毛家坪遺存說明不了秦人是從東方而來，還是出自西戎，卻能夠證明在公元前八、九世紀時，秦人已在今甘肅東部的甘谷、天水、禮縣至陝西寶雞間生息，大概就是《史記・秦本紀》上所謂的「犬丘」、「西垂」、「汧」和「汧渭之會」的地區，特別是甘谷、天水、禮縣一帶是秦人的發祥地。秦人東遷以後，仍視此處爲舊地，在天水發現的秦公簋和青銅車馬器，[5]以及近年在禮縣發現的虎形、鳥形金飾件和重環紋金飾片等，[6]都說明此地是秦人的發祥地。

秦人沿渭水向東擴展至汧水。秦襄公所居之汧，約在今甘肅隴縣磨兒塬。[7]秦文公所居在「汧渭之會」，可能在今陝西寶雞陳倉附近。秦憲公和武公所都之「平陽」，應在今寶雞陽平鎮。[8]1978年在寶雞太公廟出土的五件秦公鐘和三件秦公鎛，便是這個時期（約爲秦武公時期，即公元前697～前678年）著名的銅器。從秦公鐘銘文的記載，可以確定《史記・秦始皇本紀》引《秦紀》所記的秦文公——靜公——憲公——出公——武公的世系是正確的。[9]從非子居犬丘到武公都平陽，大約經歷了二百二十年，這可以說是秦自甘肅東部向陝西關中地區移動的第一個階段。（見圖一）

（二）雍城和秦公陵園

秦德公元年（前677）從平陽遷都雍城。雍城遺址在今陝西鳳翔縣西南，雍水自西北繞雍城東南而過，雍水之南爲秦公陵園。從德公都雍到獻公遷櫟陽，秦以雍城爲都共二百九十四年，是秦國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10]成爲春秋五霸之一。秦都櫟陽、咸

4 趙化成，〈甘肅東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學探索〉，《考古類型學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文物，1989.5），145。

5 馮國瑞，〈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隴南叢書》；又可參考王國維〈秦都邑考〉。

6 韓偉，〈罕見的文物，重要的發現——甘肅禮縣金箔飾片紀實〉，見Christiun Deydier，《秦族黃金》（倫敦，1994），35。

7 王學理等，《秦物質文化史》（西安：三秦，1994.6），67。

8 李零，〈《史記》中所見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20輯（北京：中華，1983.9），21。

9 盧連成、楊滿倉，〈陝西寶雞太公廟發現秦公鐘、秦公鎛〉，《文物》1978年1期（北京），1。

10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標點本），卷5〈秦本紀〉穆公三十七年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陽以後，仍視雍爲舊都。

雍城平面近方形，東西3480米，南北3130米。（見圖二）西城垣保存較好，其它三垣保存較差。[11]在雍城中部今馬家莊發現了秦宗廟遺址，這是一座有圍牆圍繞的封閉式的院落，南北殘長76米，東西寬87.6米，院內有北房和東西廂房，北房後還有一平面長方形的小建築；北房和東廂房保存較完整，形制相同。以北房爲例，用1.2米厚的夯土牆分隔成堂室，東西20.8米，南北13.9米，牆外有一周用河卵石鋪砌的寬0.8米的散水，南側似有雙階。西廂只存東南部分。南房存北半部，中間有路可通，可能是門塾。它約建於公元前七世紀秦穆公時期。但到公元前五世紀中葉以後，在宗廟的庭院和北房、東廂房上，挖有一百八十餘座祭祀坑，埋有牛、羊和人的骨骼，大概在這個時候宗廟建築廢棄。[12]（見圖三）在宗廟遺址西500米處，發現有五個院落，南北長326.5米，東西寬86～59.5米，應是寢宮遺址。[13]在馬家莊之西的姚家崗，1973年曾發現建築遺跡和銅質建築飾件64件，是由銅板和框架構成的箍套狀銅飾件，上飾蟠虺紋，應是連接安裝於木枋上的飾件，[14]或是文獻中所稱之「金釭」。[15]

雍城的秦公陵園在陝西鳳翔三畤原上，隔雍水與雍城遺址相望。葬德公至出公二十代秦國君，約自公元前677～前385年，是秦公陵園中最大的一處，占地約二千萬平方米。（見圖四）陵區的西、南、北側均發現有寬2～7米，深2～6米的隍濠圍繞。[16]在整個陵區內已發現有四十餘座墓葬分布在十三座陵園之內，十座陵園有隍濠。[17]（見圖五、圖六）以1號陵園爲例，它位於陵園的中部偏北，平面略似梯形，東濠長517米、西濠長450米、南濠長585.5米、北濠長825米。陵園內有8座墓，有前後墓道平面呈「中」字形的

11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秦都雍城鑽探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2期（西安），7。

12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高家莊一號建築群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2期（北京），1。

13 同註11。

14 鳳翔縣文化館、陝西省文管會，〈鳳翔先秦宮殿試掘及其銅質建築構件〉，《考古》1976年2期（北京），121。

15 楊鴻勳，〈鳳翔出土春秋秦宮銅構——金釭〉，《考古》1976年2期（北京），103。

16 韓偉，〈鳳翔秦公陵園鑽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7期（北京），30。

17 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秦公陵園第二次鑽探簡報〉，《文物》1987年5期（北京），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墓三座，有前墓道平面呈「甲」字形的一座，有短墓道的墓一座，土坑豎穴墓三座。1986年發掘了1號陵園的1號大墓。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坐西向東，墓室長54.4米，南北寬38.45～38.80米，深24米，東墓道長156.1米，西墓道長84.5米，全長達300米，是目前所發現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墓上無封土，而有建築遺跡。墓中的柏木主椁長14.4米、寬5.6米、高5.6米，副椁長6.3米、寬4.9米、高2.6米。椁室四周殉人166個，有的有棺椁，有的用薄木匣斂葬，皆頭向西，屈肢葬，在棺匣上有朱筆書寫的編號。此墓屢經漢、唐、宋各代盜掘，隨葬品已被劫毀一空，尚存有遺物殘件三千餘件，可見其原來規模之宏大。發掘者推測此墓是秦景公之墓，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18]

秦公雍城陵墓的形制，可注意的有以下幾點：*1.*陵園兆域的概念已經出現。兆域是以隍濠來界定的，既有總的兆域，也有每個國君陵園的兆域；每個陵的兆域中又有內、外兩重隍濠。*2.*陵墓的方向，以墓道爲準，都是坐西向東的；主墓多偏在陵園的南側。*3.*陵墓地面上未見封土，發現有建築物「堂」的遺跡，仍保留著商周以來的舊傳統。*4.*盛行殉葬，一直到公元前384年獻公時才廢除「從死」之制。

秦國的陵墓制度，在秦獻公以前雍城秦公陵園的遺跡中可以看出，它與中原諸國相比較，是多存舊制的。但是，這種情況，從秦獻公特別是從秦孝公以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三）櫟陽和芷陽東陵

公元前383年（獻公二年），秦從雍城遷都櫟陽。櫟陽故城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武屯。1963年開始勘查，發現了櫟陽城的南牆和西牆遺跡，發掘了南城門遺址。城內分布著十五處遺址和十三條道路遺跡，（見圖七）出土了各式卷雲紋瓦當、印有「櫟市」戳記的陶片和「半兩」、「五銖」、「大泉五

18 韓偉、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發掘研究綜述〉，《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西安），111；王學理等，《秦物質文化史》（西安：三秦，1994.6）「雍城墓地」，256。韓文所發表的雍城秦公1號陵園1號大墓的主副椁尺寸與王文所發表的不同，王文主椁爲16×5.7×4.2米，副椁爲6×4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大布黃千」等錢幣。[19] 秦獻公和孝公以櫟陽爲都僅二十四年（前383～前350），西漢初雖曾短期以櫟陽爲都，均未進行長期建設，東漢以後逐漸廢棄。櫟陽城遺址的規模遠不如其後的咸陽和長安，但它卻是秦國變法振興的象徵，從此開始，秦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獻公葬「嚻圈」，孝公葬「弟圈」，推測皆在櫟陽城東。[20]惠文王的公陵和悼武王的永陵，皆在咸陽原上，墓上出現了巨大的封土。[21]

秦國自公元前三世紀昭襄王開始，在芷陽建東陵，葬於東陵的有三王四后和一個太子。東陵在今陝西臨潼縣驪山西麓㈦原上，陵園遺址陸續被發現。[22]第一號陵園的主墓是兩座南北並列的亞字形大墓，墓頂封土呈長方形，東西250米、南北150米、高2～4米，相距40米。在主墓南北各有一處建築基址，陪葬墓在主墓東面，周圍有隍濠圍繞。[23]第二號陵園的主墓由一座中字形和兩座甲字形大墓組成，中字形大墓地面殘留封土高10米，甲字形大墓的地面上也有高2米的封土。陪葬墓在主墓之北，建築基址在主墓之西，周圍也有隍濠。[24]東陵陵園內的建築基址應是寢殿遺址。

從雍城秦公陵到芷陽秦東陵，在陵園制度上發生了巨大變革；前者在墓上建堂，後者墓上則改築封土，並於墓旁建寢殿。雖然東陵寢殿的形制還不清楚，但其布局正與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所說的「秦始出寢，起於墓側」相符合。秦國陵墓制度的變革完成於公元前四世紀和前三世紀之際，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爲它直接影響到秦始皇的陵墓制度，秦始皇的陵墓制度又爲中國歷代陵墓制度奠立了基礎。[25]

---

19 陝西省文物委員會，〈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文物》1966年1期（北京），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3期（北京），353。

20 王學理，《秦都咸陽》（西安：陝西人民，1985.10），第二章註13，57。

21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紀要〉，《考古與文物》1988年5、6期（西安），133。

22 驪山學會，〈秦東陵探查初議〉，《考古與文物》1987年4期（西安），88。

2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東陵第一號陵園勘查記〉，《考古與文物》1987年4期（西安），19。

24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東陵第二號陵園勘查記〉，《考古與文物》1990年4期（西安），22。

25 徐蘋芳，〈中國古代的墳丘墓〉，《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1995.7），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秦始皇統一

（一）秦咸陽宮和阿房宮遺跡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從櫟陽遷都咸陽。此時正值商鞅變法，秦國的社會正經歷著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秦國地處西陲，舊傳統的影響，相對地說比關東諸國要淡薄的多，因此，它在接受新事物方面的條件較好。咸陽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舞臺。不論從文獻記載或考古發現來看，咸陽是否有城？今天仍然是個謎。先築宮後建城，似乎是當時通行的做法。秦始皇統一全國（前221）後，他感到咸陽宮地狹人多，便決定向渭河以南的平原地區發展，興建阿房宮。從已發現的咸陽宮遺跡和阿房宮遺跡相比較，阿房宮的規模要比咸陽宮大的多。但是，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沒有來得及做出是在咸陽宮還是在阿房宮築城的計劃。

咸陽東窯店牛羊村北塬上發現的三處咸陽宮遺址，（見圖八）都是高臺建築。一號建築遺址東西長60米、南北寬45米、高6米，分上下兩層，上層由若干殿堂組成，殿堂間有迴廊相連，下層四周建居室，也有迴廊和散水的遺跡。[26]（見圖九）二號建築遺址在一號建築遺址的西北，相距93米；平面作曲尺形，東西長 127 米、南北寬 32.8～45.5 米，主體殿堂平面呈方形（19.8×19.5米），另有四處較小的居室，皆在高臺之上，高臺的迴廊東南與一號建築遺址相連。[27]三號建築遺址在一號建築遺址的西南，也相連接。[28]實際上這三處建築遺址是互相連接的一個大建築群。從出土的各式瓦當、陶質下水管道和刻有龍紋的空心磚等建築構件看，是很豪華的建築，特別是殘存壁畫的發現，更證實了這一點。規模宏大的阿房宮，是秦朝未完成的建築

26 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1976 年 11 期（北京），12；陶復，〈秦咸陽宮第一號遺址復原問題的初步探討〉，《文物》1976 年 11 期（北京），31。

27 秦都咸陽考古工作隊，〈秦咸陽宮第二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 年 4 期（西安），9。

28 王學理等，《秦物質文化史》，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工程。阿房宮遺址位於今西安三橋鎮。九百多年前阿房宮的宮牆便已「悉爲民田」了，[29]現在地面上只存巨大夯土臺基，東西長1300米、南北寬500米、高7米。

除阿房宮之外，秦始皇在咸陽塬上還建有六國宮殿、蘭池宮、甘泉宮、宜春宮等，在乾縣建有梁山宮，在涇陽建有望夷宮，皆有遺跡可尋。[30]

秦始皇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大規模營建咸陽渭北和渭南，以及關中地區的宮苑，並移六國貴族之後和豪富至咸陽，皆出於統一全國的政治目的，宣揚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權威。

（二）秦始皇的巡視和行宮遺址

秦始皇統一全國（前221）後，爲了鞏固他的統一基業，親自巡視全國，二十八年（前219）東行至泰山，登之罘，至琅邪，復由彭城至衡山、南郡。三十二年（前215）出遊至雲夢，再至浙江、會稽，祭大禹，過吳北歸琅邪，死於沙邱。所到之處皆刻石紀事以頌功德，始刻於鄒嶧，其次爲泰山、琅邪、之罘、碣石和會稽。今尚存琅邪刻石和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原在山東諸城，黏合後的刻石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泰山刻石僅存殘石，現在山東泰安岱廟中。

秦始皇巡行之時，統一了全國的交通，即所謂「車同軌」。他修建了馳道和直道，馳道是自咸陽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遺跡多已泯滅。直道是從咸陽附近的甘泉宮北通九原郡的道路，近年在子午嶺和鄂爾多斯草原上發現了秦直道的遺跡。[31]

秦始皇巡視各地多建有行宮。近年在河北省秦皇島市和遼寧省綏中縣發現了秦始皇所建之「碣石宮」遺址。這片遺址北起綏中的止錨灣、瓦子地、石碑地和黑山頭，沿渤海灣南至秦皇島市的老龍頭和金山嘴，綿亙約四十公

29 [宋]宋敏求，《長安志》（《經訓堂叢書》本），卷12：「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西北（東），三面有牆，南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崇八尺，上闊四尺五寸，下闊一丈五尺，今悉爲民田。」宋敏求作《長安志》在北宋熙寧九年（1076）。

30 王學理等，《秦物質文化史》，110～118。

31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遺跡的探索〉，《文物》1975年10期（北京），44；又見《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1991.12），435～4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里，已發掘了金山嘴、黑山頭和石碑地遺址。金山嘴遺址有四組以上的建築，北面最大一組由兩個面闊五間、進深四間的宮殿遺址組成，南面有不對稱的七個房間，東西兩側也有若干房屋基址。[32]黑山頭是渤海岸邊聳立的一個高19米的礁石，石上有南北長100米，東西寬60米的平坦地帶，就在這塊平地上建有十餘間房屋建築，皆築於夯土臺基上。[33]與它相對的海中有三塊矗立的礁石，俗稱「姜女墳」，自黑山頭海灘至姜女墳礁石之間，鋪設有岩石走道，落潮時可以步行入海。在石碑地遺址發掘了大面積的宮廟遺址。（見圖十、圖十一）在已發掘的遺址中，只出土磚瓦等建築材料，（見圖十二）很少有日用生活器皿。同時，從建築的布局上也可以看出，瀕臨海岸的「碣石宮」遺址，多半是與祭祀有關的遺跡。而在石碑地之北的瓦子地卻出土了大量日用生活器皿，這裡可能是行宮的生活區域。

「碣石宮」遺址的發掘，說明它與秦咸陽宮和阿房宮等一樣，都是以規模宏大爲特徵。出土的直徑52厘米的夔紋瓦當和直徑42厘米的卷雲紋瓦當，與咸陽宮和始皇陵出土的完全一致，證實「碣石宮」的營造確出於秦之工官。

（三）秦始皇陵

最能表現秦始皇統一中國業績的有兩處遺跡：一是萬里長城，我們將在下一節中專門敘述；二是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在今陝西臨潼驪山下，至今地面上尚存有巨大的夯土墳丘。近年以來，對秦始皇陵園遺址進行了勘測，在墳丘以北發現了寢殿遺跡；在陵園以東發現和發掘了埋藏儀仗鹵簿的車馬俑坑，在墳丘之西發現了銅車馬。秦始皇陵園考古轟動世界。

秦始皇陵園平面呈長方形，有兩重陵垣，外陵垣南北長2165米，東西寬940米，周長6210米，垣基寬約8米，四面各有一門。內陵垣南北長1355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金山嘴秦代建築遺址發掘報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石家莊），267。

33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綏中縣「姜女墳」秦漢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8期（北京），25；〈遼寧綏中縣「姜女石」秦漢建築羣址石碑地遺址的勘探與試掘〉，《考古》1997年10期（北京），36；〈遼寧綏中石碑地秦漢宮城遺址1993～1995年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10期（北京），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東西寬580米，周長3870米。南、東、西各有一門，北面二門。墳丘在內垣南部，高76米，平面方形（基485×515米，現存地面封土底爲345×350米），用夯土築成，呈覆斗形，中腰有一層臺階，頂部爲一平臺。經長年勘察，墳丘上無任何建築遺跡。封土下的地宮宮牆係用未經焙燒的磚坯砌成的，南北長460米，東西寬392米，牆體高厚各4米。四面各有一門，東門爲五個門道，其餘三面皆一個門道。內垣北部分兩部分，東部爲東西寬330米的隔城，西部靠近墳丘北部爲寢殿遺址，寢殿之北爲便殿遺址。在內外垣之間稍偏北的地區爲寺園吏舍遺址。在墳丘周圍有許多陪葬坑，著名的銅車馬坑在墳丘西面內垣西門里。內垣西門外有珍禽異獸陪葬坑。陪葬墓區和馬坑都在外垣東門外以南，兵馬俑坑在陵園東門外稍偏北1.5公里處。[34]秦始皇陵坐西向東，以高大墳丘爲中心的陵園軸線偏在陵園的南部，寢殿便殿在中軸線以北，陪葬墓區和作爲儀仗的兵馬俑都佈置在陵園東面中軸線兩側。（見圖十三）從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即帝位開始，他便營建陵園，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陵園工程尚未完成，前後共達37年。《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 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

陵園工程之浩大，埋葬遺物之豐富，是可以想見的。秦始皇陵墓尚未經科學考古發掘，保存如何不得而知，但從有關的歷史文獻記載看，秦亡後始皇陵曾被盜掘焚毀，儀仗兵馬俑坑的發掘已證明了這一史實。

一號兵馬俑坑平面呈長方形（230×62米），發現陶俑陶馬約二千餘件，木質戰車20乘（輛），各種青銅兵器約四萬餘件。[35]二號兵馬俑坑位於一號坑的東端北側，平面呈曲尺形，東西長124米，南北寬98米。[36]三號兵馬俑

34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紀要〉，《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合期（西安），133。

35 根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北京：文物，1988.10）統計。

36 秦俑考古隊，〈秦始皇陵東側第二號兵馬俑坑鑽探試掘簡報〉，《文物》1978年5期（北京），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坑位於一號坑西端北側，平面呈「凹」字形，東西長 17.6 米，南北寬 21.4 米。[37]在二、三號坑之間，尚有未建成的俑坑，這與《史記》上記始皇陵工程「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郦山」相符。

秦始皇陵發現的銅車馬和兵馬俑坑所表現的是秦始皇生前出行時的儀仗鹵簿。在墳丘後面中軸線上發現的銅車馬，是秦始皇出行的車隊模型。車有兩種，一是二號銅車馬，通長 3.17 米，車高 1.06 米，套駕四馬。車輿（車箱）分前後兩部分，平面呈凸字形，前部爲御者（駕車者）所坐，有跽坐的御官銅俑一人；後部四周有箱板，前有軾，後開門，左右兩側和前方各有窗。車輿上覆橢圓狀拱形車蓋。[38]這是當時最高級華麗的重輿輜車模型，[39]象徵秦始皇出行時的座車。另外還有一號車，是扈從秦始皇座車的軺車。[40]在墳丘前中軸線北側的兵馬俑坑，是秦始皇出行時的儀仗隊模型，第一號兵馬俑坑的十一個過道中有六乘車，車與車之間有十八至二十餘排士兵，手執弓弩劍戈等武器。第二號兵馬俑坑是以乘車、騎兵和士兵組成的儀仗隊，分列在十四個過道之中，二號坑的考古發掘正在進行，全面揭露之後，將會有新的研究成果發表。這種在陵前以陶塑泥俑再現皇帝出行時之威嚴的情況，一直延續到後世。漢長陵陪葬墓發現的儀仗俑群和北朝隋唐墓中發現的儀仗壁畫和俑群，都可以證實秦始皇陵兵馬俑坑象徵的是秦始皇出行時的儀仗鹵簿。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發現，在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說明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在公元前三世紀已達到了寫實藝術的頂峰，秦兵馬俑與真人的尺寸大小一致，不論從服飾、髮飾或面部表情上來看，都是極其逼真和各有個性的。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在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上意義重大，它被列爲世界文化遺產，是當之無愧的。

---

37 秦俑考古隊，〈秦始皇陵東側第三號兵馬俑坑清理簡報〉，《文物》1979 年 12 期（北京），1。

38 陝西省秦俑考古隊，〈秦陵二號銅車馬〉，《考古與文物叢刊》第 1 號，1983.11。

39 孫機，〈始皇陵 2 號銅車對車制研究的新啓示〉（原載於《文物》1983 年 7 期），收入該氏所著《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1993.6），3。

40 孫機，〈略論始皇陵 1 號銅車〉（原載於《文物》1991 年 1 期），收入《中國古輿服論叢》，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秦長城遺跡

在秦統一前的戰國時代，有些國家在邊境上築有各自的長城。秦統一後重新修建秦始皇長城時，曾部分利用了秦、趙、燕三國長城的舊基。

考古學上所見秦始皇長城可分爲西、北、東三段。（見圖十四）西段自甘肅臨洮至內蒙古的準格爾旗，考古調查得知：其遺跡起自臨洮縣北三十墩，經渭源、隴西、通渭、靜寧，寧夏之西吉、固原，再入甘肅之鎮原、環縣、華池，入陝西吳旗、志丹、靖邊、榆林、神木，而入內蒙古準格爾旗。[41]這是秦昭襄王時所築之長城，秦始皇統一後，更向西拓展，《史記・秦始皇本紀》記這段新築長城是「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四十四縣，城河上爲塞」，應是從今甘肅蘭州以東，接臨洮秦昭襄王時所築之長城，沿黃河北上至河套。在這段地區尚有明長城存在，但未發現秦長城遺跡。秦始皇築這段長城是爲了北接河套段長城，在戰略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秦始皇長城北段有三條。第一條是河套段，即從內蒙杭錦旗，南包河套地區，由潮格旗南經狼山、石藍計、烏拉特旗至固陽、武川而入大青山。[42]第二條起自包頭市以北，穿大青山至呼和浩特市北，東至卓資，察右前旗。[43]這兩條長城皆爲戰國時期趙國武靈王所築，秦統一後仍利用了這兩條長城，特別是第一條包容河套地區的長城，南接秦始皇新築的「河上塞」，是秦始皇「收河南」的屏障。著名的戰略要地高闕遺跡，便在狼山之南的石藍計。[44]第三條從內蒙古四子王旗經商都、化德，至河北康保，再入內蒙古太僕寺旗、正藍旗和多倫，然後經河北豐寧、圍場而重入內蒙古昭烏達盟之赤峰

41 定西文化局長城考察組，〈定西地區戰國秦長城遺跡考察記〉，《文物》1987 年 7 期（北京），50；陳守忠，〈甘肅境內秦長城遺跡調查及考證〉，《西北史地》1984 年 2 期（蘭州），88；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寧夏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跡〉，《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北京：文物，1981 年 2 月），45；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漢時期諸長城遺迹的初探〉，《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52；史念海，〈鄂爾多斯高原東部戰國時期秦長城遺跡探索記〉，《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68。

42 蓋山林、陸思賢，〈內蒙古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跡〉，《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1980.12），212。

43 蓋山林、陸思賢，〈陰山南麓的趙長城〉，《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21。

44 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文物》1977 年 5 期（北京），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市，這是秦始皇統一後新築之長城，在其南尚有戰國時代燕國長城。[45]考古學上所見的這些秦始皇長城遺跡，證明秦始皇統一後並未完全利用戰國舊城，而是根據當時之形勢向北拓展了防線。

秦始皇長城東段自赤峰開始，西接北段第三條長城，向東至敖漢旗，入遼寧阜新。在其南也有一條燕國長城，與其平行而東，至阜新會合，[46]從彰武、法庫、開原一帶，跨遼河折向南，經新賓、寬甸至朝鮮。

秦始皇修建的長城，表現了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建築工程的巨大成就，同時，它也是留存至今的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見證。雖然，今天我們所見的矗立在地面上的萬里長城大部分是明代重修的，但尋根溯源，秦長城畢竟是其原始。這個偉大的工程，經歷了二千年的風霜，仍屹立於地球之上，這在人類文化史上是一個奇蹟，也是世界歷史文化的重要遺產。

（五）秦始皇統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

中國古代文字發展到東周時期（前770～前221），由於列國分立，各行其事，在文字的書寫上也各有特點，中國文字呈現出了變異的趨勢：大體上可以分爲西土和東土兩系。西土系即東漢許愼《說文解字・敘》中所說的「史籀大篆」，亦即秦的文字。東土系即六國文字，漢人所謂之古文，[47]如河南信陽楚簡文字，如晉國的中肥末銳形似蝌蚪的侯馬盟書，如南方楚、越、蔡等國銅器上的鳥書（實際上是一種美術字）。至於戰國時期的陶器、兵器、璽印和貨幣上的文字，更是變化奇詭。[48]同時，新出現的簡化、假借字也很多，且無規範可尋，地域不同，書體各異。六國文字的歧異，給統一後的秦帶來了不便，因此，秦始皇下令以秦的史籀大篆和省改的小篆爲準，統一天下文字。大篆多用於正式公文和典禮，小篆則用於一般公文，而更簡便的隸書則通行於民間。隸書到漢代變爲八分書，成爲通行文字，由隸而

45 鄭紹宗，〈河北省戰國、秦、漢時期古長城和城陣遺址〉，《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34；布尼阿林，〈河北省圍場縣燕秦長城調查報告〉，《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40。

46 李慶發、張克舉，〈遼西地區燕秦長城調查報告〉，《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2期（瀋陽），40；項春松，〈昭烏達盟燕秦長城遺址調查報告〉，《中國長城遺跡調查報告集》，6。

47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第2冊，卷7，305。

48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北京：文物，1991年增訂本），第二十八章〈文字〉，3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楷，中國漢字的結構定型。

秦始皇統一文字，其初衷不過是爲了政府公文書寫之便，但它對後世的影響卻遠不止於此，正是由於文字的統一才克服了方言的障礙，維繫了中華文化的傳承，歷兩千餘年而不衰，這個歷史作用是極其巨大的。

中國古代的金屬貨幣是在春秋戰國後期出現的，貨幣的形式有布、刀、鈑、貝和圜錢。[49]最初出現的是東周的空首布，晉國也流行空首布，三晉地區的韓、趙、魏繼承東周和晉的傳統，皆流行空首布，圓跨者爲多，也有聳肩者，也有尖腳者，[50]趙國還流行三孔布。[51]貨幣的單位是「釿」或「鎒」。刀幣主要流行於燕、齊兩國。燕國之刀幣稱爲明刀，主要出土於北京市、內蒙古、河北、遼寧、吉林等省，[52]其貨幣單位爲「化」。齊國刀幣銘爲「法化」。南方楚國的貨幣是金鈑，稱爲「郢𠂤（爰）」，即爰金，實際上是以金塊鈐印的貨幣。比郢爰面值小的是銅貝，亦稱爲蟻鼻錢。圜錢出現於戰國晚期，河南洛陽發現的「安臧」、「東周」圜錢，周郭圓穿，很可能是魏國的貨幣，[53]在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國大墓上出有「垣」字圜錢。[54]趙國圜錢文曰「藺」和「離石」。齊國圜錢文曰「鎰化」。

秦國在統一前使用方穿無郭的「半兩」圜錢，還用布帛作爲貨幣。統一後則以「半兩」錢爲全國通行的貨幣，由政府來統一發行，是秦政府控制經濟的主要手段。

控制經濟和賦稅的另一個重要手段，便是統一全國度量衡。秦國在商鞅變法時（前356），已統一了秦國的度量衡。最著名的商鞅量（方升）爲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頒發到重泉地方（今陝西蒲城）的標準升，全長18.7厘米，實測方升內口爲 12.4774×6.972×2.323 厘米，容積爲 202.15 立方厘

49 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北京：科學，1957）。

50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二十四章〈貨幣〉，305。

51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 年 2 期（北京）。

52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 10 冊（1955，北京），69；三宅俊成，《東北アジア考古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57），終章第三節第一項。

53 同註 50。

54 此「垣」字圜錢發現於固圍村一號墓上層擾土中，不是出在墓室中。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北京：科學，1956），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米。[55]（見圖十五）戰國時代，各國度量衡制混亂，計量單位也很不一致。以量爲例，秦以升、斗、桶（斛）爲單位，齊以升、豆、區、釜、鍾爲單位，燕以斛爲單位。秦國的衡制，斤以下有兩和銖，楚、魏則有鈐（鍰），魏還有大於斤的鎰。即便是同一個計量單位，又分公制和私制，極爲不便。

秦始皇統一後，便以商鞅變法所改之秦國度量衡制度，頒行天下。秦尺未見實物，以傳河南洛陽金村古墓出土的銅尺和商鞅量所合尺寸推測，秦一尺應在23厘米左右。秦之量器，傳世和出土的很多，有銅的、陶的和木質的，皆有詔書刻於其上，（見圖十六）木質的上面嵌銅板詔書，器朽後，僅存銅板詔書。詔書一般皆爲秦始皇廿六年的，也有秦二世元年加刻的。其容積約在194毫升至204毫升之間。秦衡器出土亦多，尤以銅權最多，鐵權次之。陝西西安阿房宮遺址出土的高奴禾石銅權，重30750克，（見圖十七）有秦始皇統一前「三年」詔書，以及統一後加刻的廿六年、二世元年詔書。[56]江蘇盱眙出土的秦始皇廿六年詔書銅石權，重30430克。[57]山東文登和山西左雲都曾出土過秦始皇廿六年詔書鐵石權。[58]以石權的重量折合每斤約250克左右。

度量衡的統一，由於在量衡器上有詔書刻辭，所以秦量和秦權的發現地點，還反映著秦統一後政令布達的情況。以北方爲例，在內蒙古赤峰和奈曼旗都曾發現過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詔書的陶量。[59]（見圖十八）

55 馬承源，〈商鞅方升和戰國量制〉，《文物》1972年6期（北京），17；國家計量總局等，《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北京：文物，1984），44。

56 陝西省博物館，〈西安市西郊商黨村出土秦高奴銅石權〉，《文物》1964年9期（北京），42；《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112～113。

57 南京博物院，〈江蘇盱眙東陽公社出土的秦權〉，《文物》1965年11期（北京），50；《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117。

58 吳連城，〈山西左雲縣出土秦權介紹〉，《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8期（北京），41；《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116、118。

5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9年2期（北京），215；奈曼旗善寶營子古城出土的秦陶量已殘；又見《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漢武帝完成秦統一大業

秦統一中國的事業，不只是政權上的全國大一統，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和政體從血緣封建關係向中央集權地緣關係的轉變，亦即從周的分封制向秦的中央集權郡縣制的轉變。這是秦在改革變法中的核心問題。這個轉變在商鞅變法中經歷了第一次新舊勢力的較量。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全力推行郡縣制，初置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餘郡，[60]縣約在一千左右。[61]中央集權郡縣制地緣政體的建立，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化中的最關鍵的一次變化。發生在漢代初年的分封異姓和同姓王國，不過是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出現的暫時的曲折和反覆。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漢武帝順應歷史的潮流，他完成了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大業，促進了中國歷史從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的轉變。秦皇漢武都是對中國歷史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

（一）郡縣制的推行與秦漢地方城市的發展

秦漢考古學上一個重要內容是地方城市遺址的普遍出現，這無疑是秦漢推行郡縣制的反映。

近年調查發掘的秦漢城市遺址，根據八十年代的統計約近二百處。其中內地郡縣城址約九十餘處，邊郡城址約一百餘處。邊郡城址中多是長城沿線的軍事城堡，但也有邊郡縣城，可斷定的有朔方、五原、雲中、定襄、西河、雁門、右北平和遼東諸邊郡縣城址十八處。[62]實際上，目前所發現的秦漢城市遺址尚不止此數。以河南省所轄的地區爲例，曾屬秦和西漢的三川郡、南陽郡、河內郡、潁川郡、陳郡、碭郡、河南郡、汝南郡、陳留郡、淮陽郡和東郡、衡山郡的一部分。到1991年爲止，在河南省共發現秦漢至魏晉

60 譚其驤，〈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1987.7），1～21。

61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5 三版），35。

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1984.5），第四章第二節〈漢代的城邑與邊塞遺址〉，393～4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北朝時期的城址約一百餘處。[63]

秦漢城市的形制與先秦城市有所不同，特別是地方城市，在郡縣制確立後，地方行政機構與城市建設相結合，地方城市是以各級地方官吏守土治民的府舍爲中心的。這個府舍在城市中形成了一個單獨封閉的區域——「子城」。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城市圖是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城邑圖〉，圖中所畫的城分爲東、西兩部分，主要建置皆在城東南部的「子城」（小城），這個小城便是地方政府的衙署所在。這種布局我們還可以在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的寧城圖、繁陽縣城圖、離石城圖、武成縣城圖和朝鮮遼東冢壁畫中所畫的遼東城圖中得到印證。[64]

這種新型的地方城市，與先秦時代方國、邦國和諸侯城市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雖然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秦、齊、晉、楚已有縣的設置。[65]但此時之郡縣城形制，因無考古資料證實，具體情況不明，或應接近秦漢之郡縣城歟？

（二）考古學上所見漢文化之分布——秦統一大業的完成

秦所建立的郡縣制，在漢代初年劉邦即位後出現了反覆。劉邦在建立漢朝的過程中，爲了回報六國舊貴族和他的部將們的功勞，並爲了劉氏的政權，乃分封異姓和同姓王侯，這樣便出現了郡縣制和分封制雙軌政體。毫無疑問，血緣分封制和中央集權郡縣制之間產生了矛盾。爲了維護中央集權郡縣制，從漢高祖開始，首先除掉異姓王侯，只餘長沙王吳芮，到文帝後七年（前157）無後國除。呂后時曾封諸呂爲王，但很快被文帝鏟除。同姓王侯，勢力漸大，擁地辟官，鑄錢煮鹽，糾集亡命，形同割據，朝廷只能控制都城附近的郡縣。賈誼曾上削地分國之策。景帝時，鼂錯再建削地之議，吳、楚七國舉兵反漢。七國之亂平定後，景帝中五年（前145）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王國丞相曰相，省裁諸官。武帝即位，進一步下推恩之令，分國予子弟，以削其勢；淮南、衡山王謀反後，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

63 《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卷》（北京：地圖，1991.12）。

64 徐蘋芳，〈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105。

65 同註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限制諸侯王國的發展，諸侯王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最後武帝設酎金律，諸侯王每歲以戶口額數交酎黃金於朝廷，在祭祀宗廟飲酎酒時交黃金，多因黃金的斤兩成色不足而坐失侯國。經過將近一百年的中央（皇帝）和地方（諸侯王）反覆較量的過程，分封的諸侯王國已名存實亡，商周以來的血緣政體，基本上已經結束。漢武帝完成了秦始皇所創立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地緣政體。元封五年（前106）設十三部刺史，由中央所派之郡守專政一方，至此，全國才真正統一。[66]

考古學的發現也充分說明了中國的統一肇始於秦完成於漢。最能代表漢文化的遺物是錢幣、人們日常佩用的銅鏡和建築物上的瓦當。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的組合類型的變化，是在文化習俗上的更進一步的融合。

中國的北方和東北地區，秦始皇統一後所築之長城及其附近所發現的遺跡遺物，已述於前。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設真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遼寧丹東鴨河尖村城址中曾發現西漢五銖錢和「安平樂未央」瓦當，此地可能是漢西安平縣城址。[67]在秦漢長城以北的黑龍江圍結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西漢宣帝五銖錢，[68]反映漢文化之影響。

西北地區，漢武帝開拓河西四郡，聯絡西域三十六國，漢文化遠播新疆，漢代的五銖錢、銅鏡和絲綢屢有發現，這已是世人皆知的史實，無庸贅述。

南方的廣東廣州市在1962年發現了一把刻有秦始皇紀年的青銅戈，上有「十四年屬邦工□□戠丞□□□」的銘文。[69]此戈的發現是秦統一嶺南的物證。[70]

1995年在廣州發現的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所用瓦當爲「萬歲」和卷雲紋瓦當，特別是卷雲紋瓦當與中原者無異；同時還出有秦半兩錢，有金質的

66 以上據[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標點本），〈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和〈吳王濞傳〉。

67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1979），93。

68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15。

69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東郊羅岡秦墓發掘簡報〉，《考古》1962 年 8 期（北京），404。

70 梁國光、麥英豪，〈秦始皇統一嶺南地區的歷史作用〉，《考古》1975 年 4 期（北京），2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有銅質的。[71]但是，南越王墓（約葬於公元前122年）的形制多存楚制，受中原漢文化影響甚少。[72]這種情況與廣州漢墓西漢前期墓葬相同。

嶺南地區漢文化影響的加深是自西漢中期武帝以後，特別是昭、宣以後（約公元前一世紀中葉）起了很大的變化。從廣州漢墓中可以看出，西漢中期以後，隨葬陶器中漢式的竈、井、倉、囷模型器出現，帶有地區性的陶器消失；普遍隨葬五銖錢；銅鏡則以漢式的昭明鏡和日光鏡爲主，還有四乳蟠紋鏡等，戰國式銅鏡消失。[73]在廣東樂昌西漢中期墓中，漢式陶器如鼎、壺、簋、燈、薰爐等，逐漸占主位，取代了有地方特色的瓿、三足盒等。[74]遠處海南島樂東縣潭培鄉出土的西漢「朱廬執刲」蛇紐銀印，是賜給有功的朱廬守官的，朱廬是西漢元帝初元三年（前111）所設的縣。[75]

廣西、貴州漢文化的傳布稍遲於廣東。貴州漢墓墓葬形式的變化發生在西漢後期，地面出現高大封土堆，墓內隨葬品多爲漢式的陶器、銅鐵器和漆器，出土大量的西漢五銖錢和日光鏡、昭明鏡、四乳蟠紋鏡和星雲鏡，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已保留甚少。[76]

雲南在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設益州郡後，中原漢文化的影響日益加深，在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遺址中出土有半兩錢、五銖錢，銅鏡中有昭明鏡、日光鏡、百乳鏡、草葉紋鏡，還有刻「河內工官」銘的銅弩機，以及漢字印章等；提梁壺、釜、甑、鐎斗、耳杯、帶鉤等漢式器物相繼輸入，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式器物數量增多，至西漢末東漢初年，中原漢文化已基本上與當地的土著文化融爲一體了。[77]

考古學上所見漢文化的推進，明確地顯示出漢武帝完成秦統一大業之後，中華民族文化出現了第一次大融合。這次文化大融合的深刻的社會背景是社會政治結構上的根本性的變革，即從血緣政體向地緣政體的變革。

---

71 〈廣州發現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中國文物報》1996年2月11日（北京）。

72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1991）。

73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北京：文物，1981）。

74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北京：文物，1990），223。

75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246。

76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268。

77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3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先秦時代結束了。中國文明從誕生到發展，在秦以後邁入了另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責任編輯：張文昌　　校對：王珍琳、許立霖、顧立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orm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Qin Empire as Seen in Archaeology

Xu, Pingfang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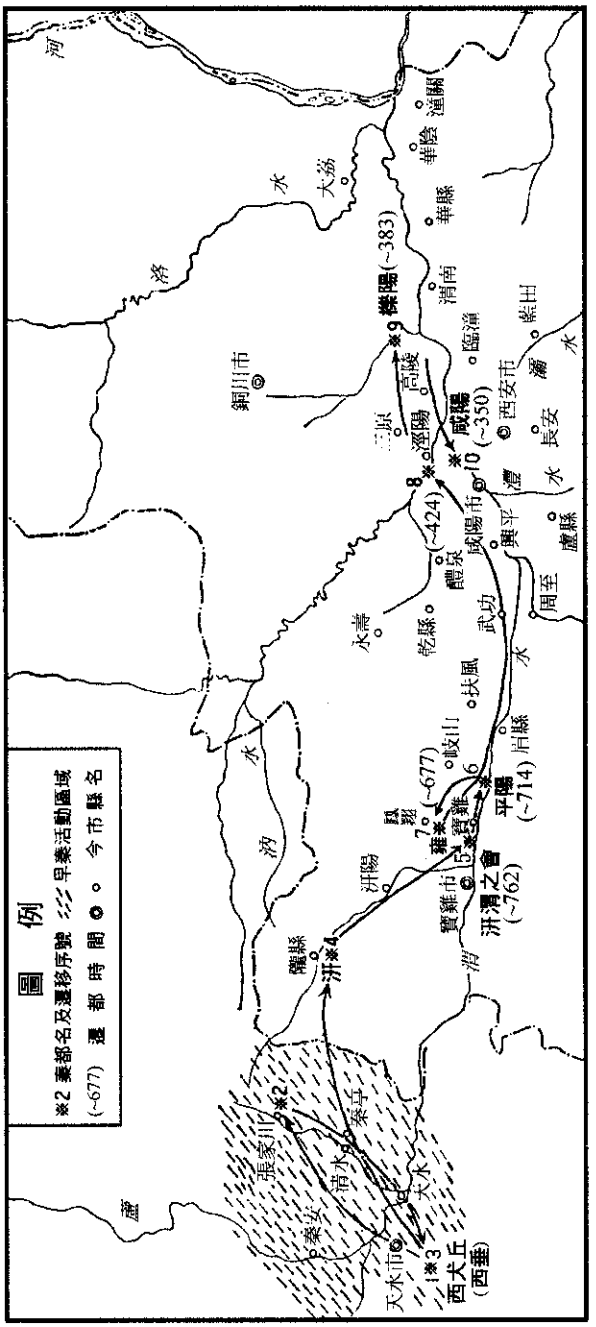
The earliest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Qin culture are at the site of Mao-jia Ping, Gan-gu, Gan-su province. The finds unearthed at Tian-shui, Li-xian of Gan-su and Bao-ji of Shan-xi testify to the eastward move of the Qin people from the eastern Gan-su. In 677 B.C., Qin people moved their capital to Yong-cheng, and in 383 B.C., moved again eastward to Li-yang. The remains at these two cities and the near imperial mausoleums shed much li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Qin culture at the time.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unified China in 221 B.C. and established the first centralized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The imperial palaces at Xian-yang and Jie-shi, the mausoleum of the First Emperor, the remains of the Great Wall discovered in Gan-su, Ning-xia, Shan-xi, Inner Mongolia, He-bei, and Liao-ning show well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Qin culture.

Yet, the Qin dynasty did not last long. A true unification of China was not completed until the time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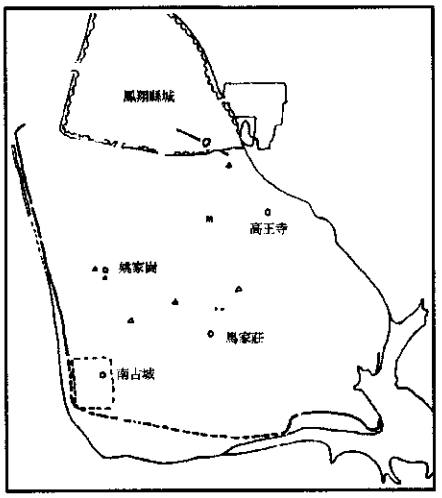
Keywords:Mao-jia Ping, Yong-cheng, Palace at Xian-yang, the Great Wall of Qin, The Mausoleum of the First Empero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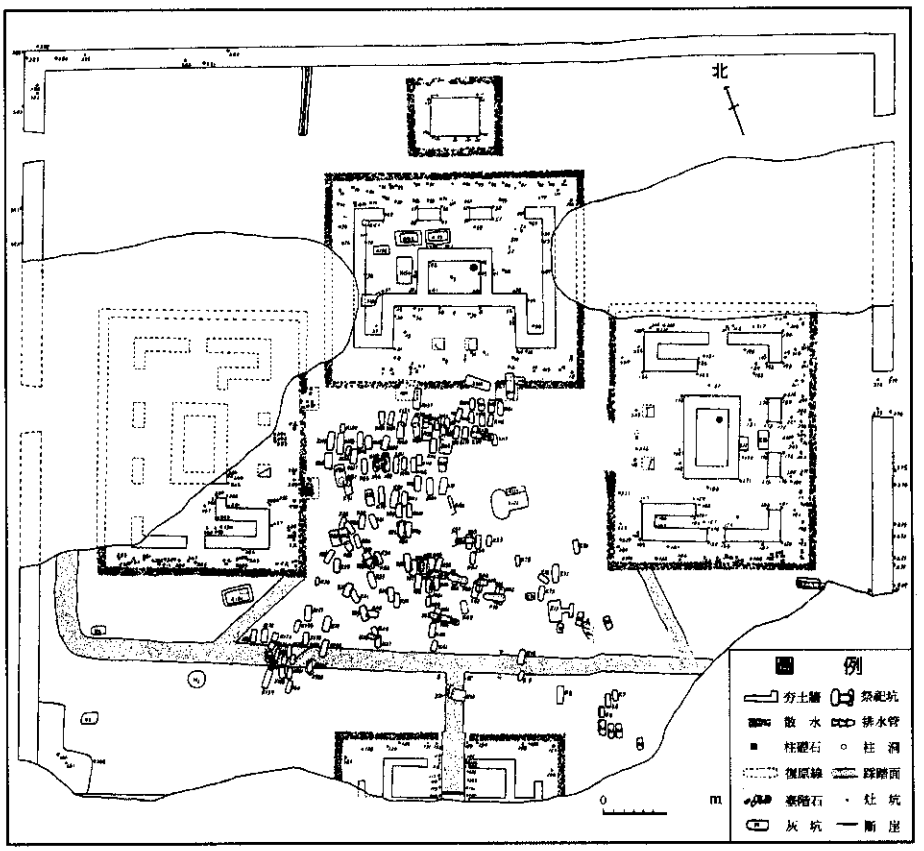
圖一 秦人都城遷徙線示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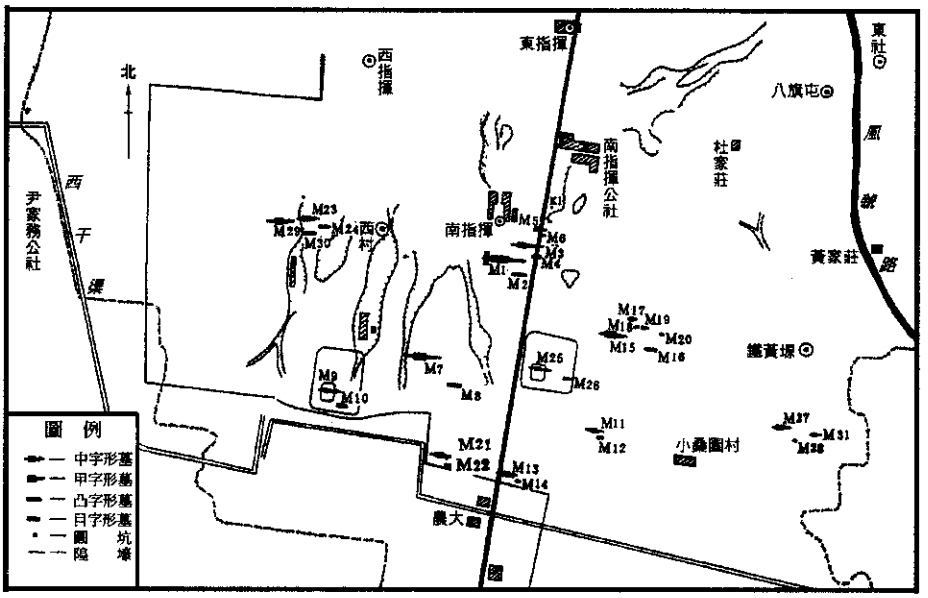


圖二　陝西鳳翔秦雍城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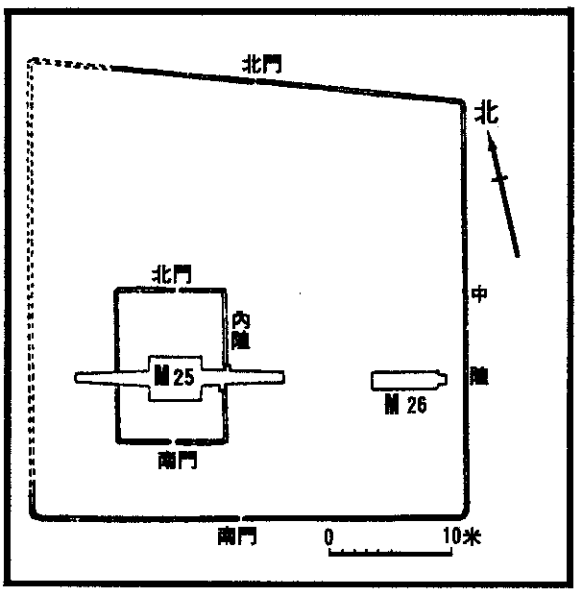
圖三　鳳翔秦雍城馬家莊一號遺址平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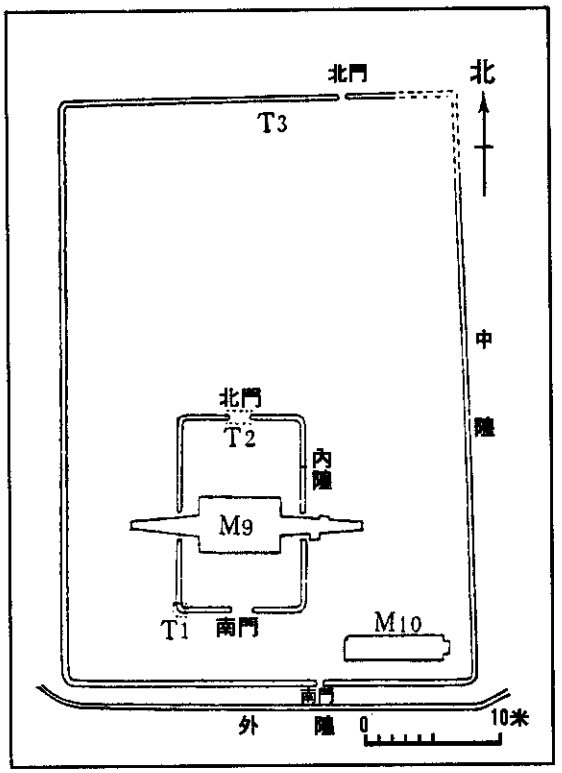


圖四 鳳翔秦公陵園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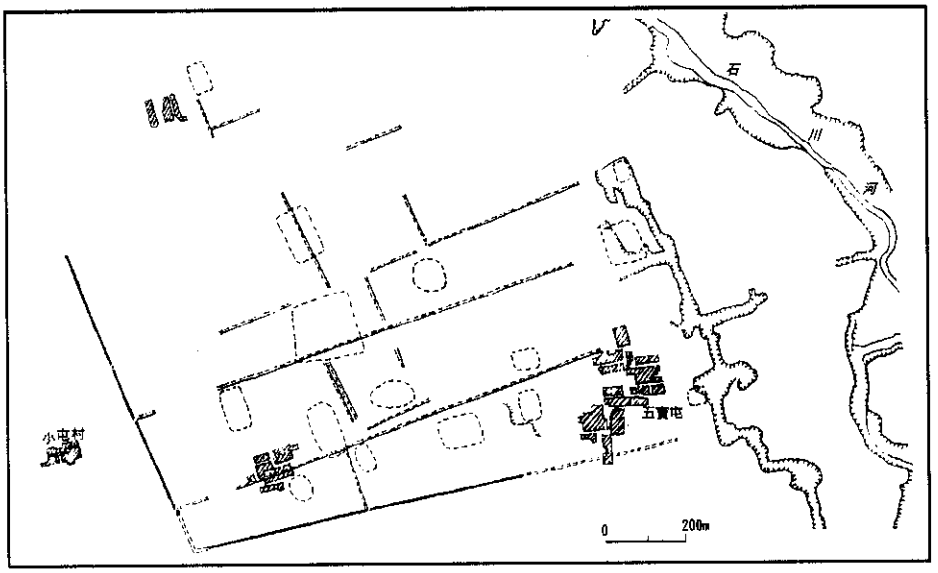


圖五 鳳翔秦公陵M25內、中隍平面示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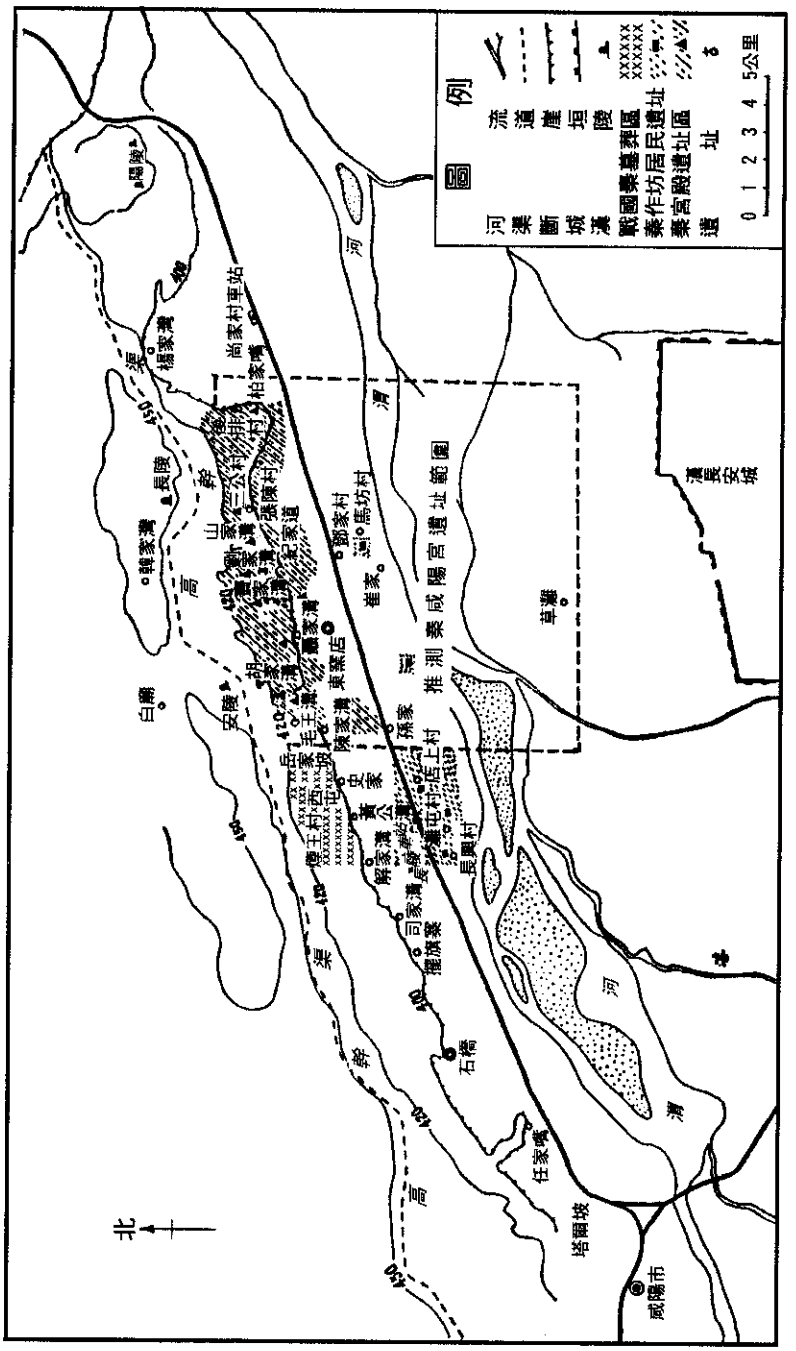


圖六　鳳翔秦公陵M9內、中隍平面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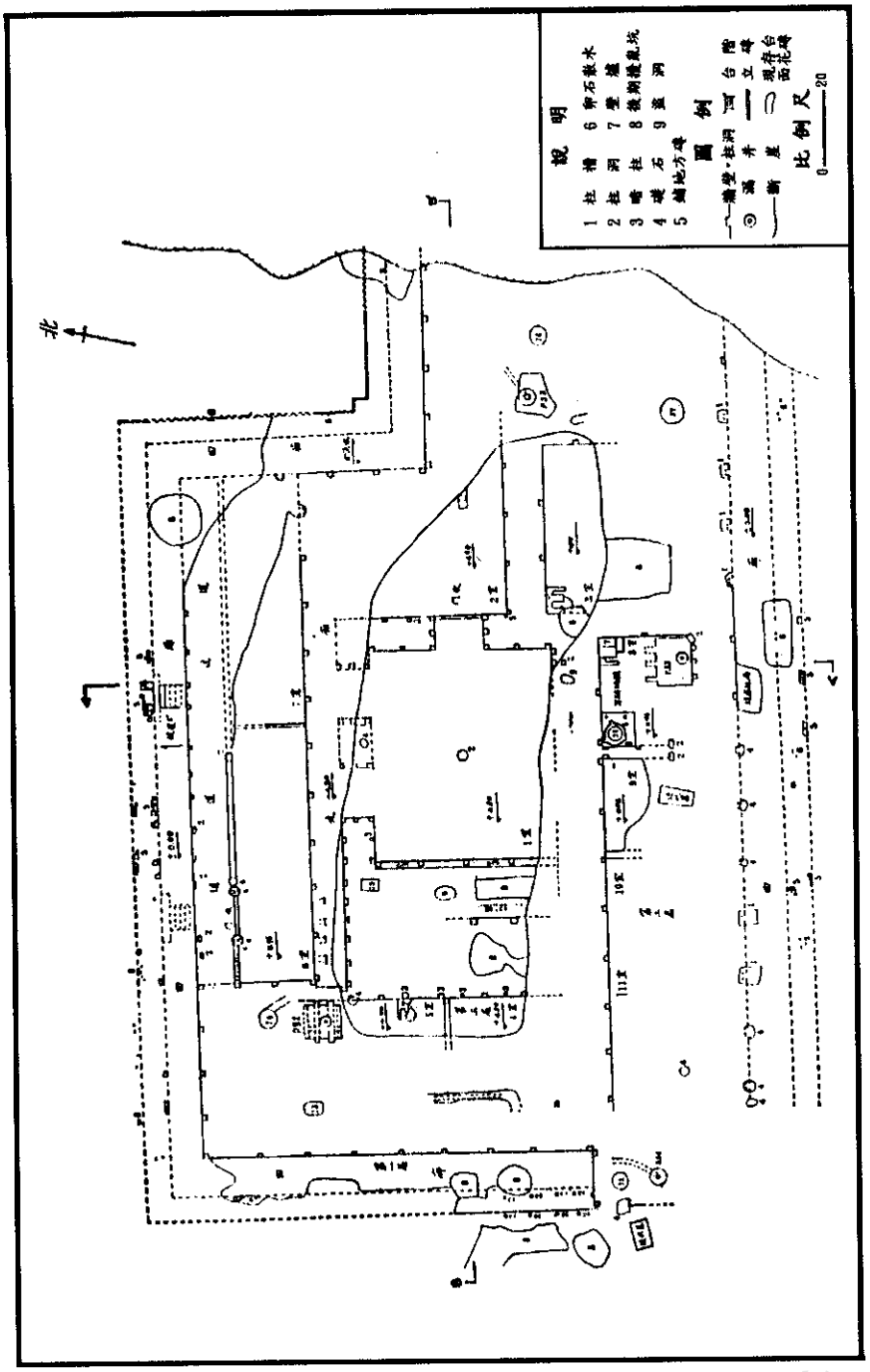
圖七　陝西臨潼秦櫟陽城平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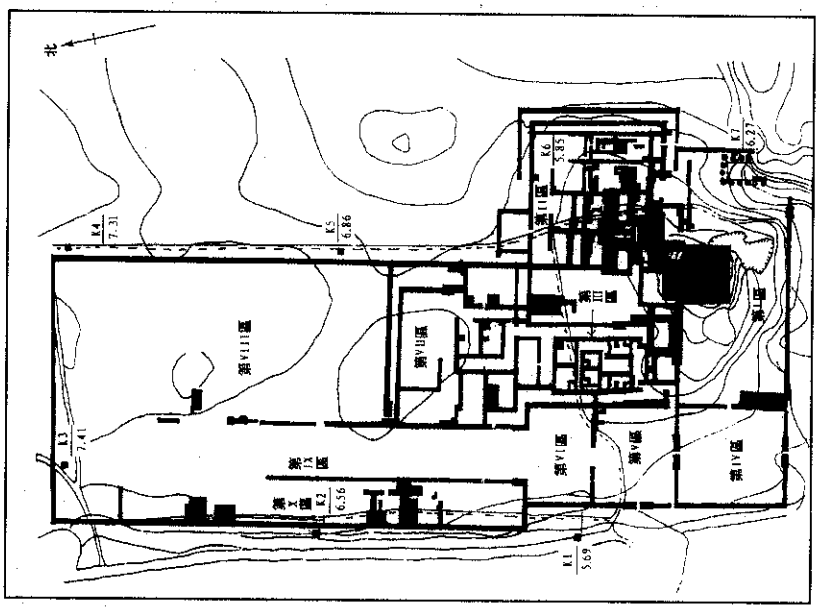
圖八 秦咸陽遺址範圍示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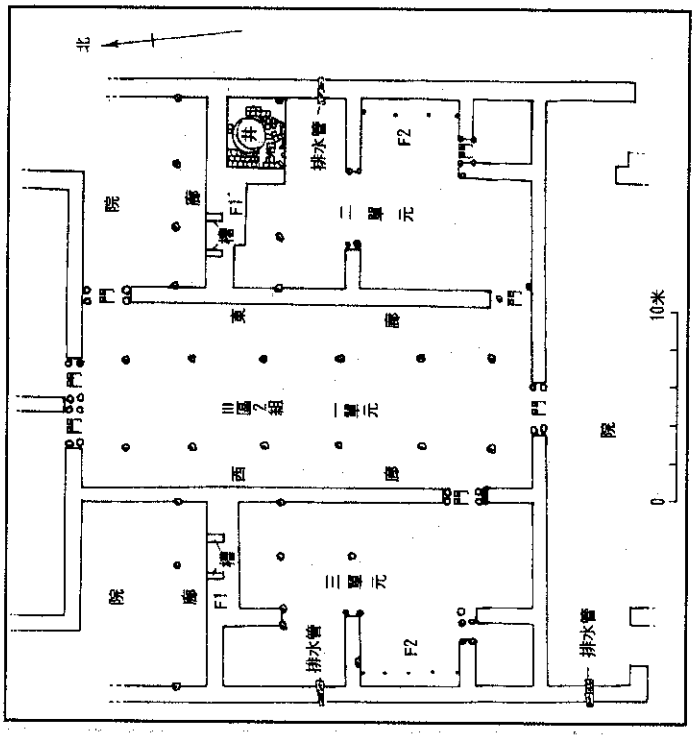


圖九　秦咸陽一號建築遺址平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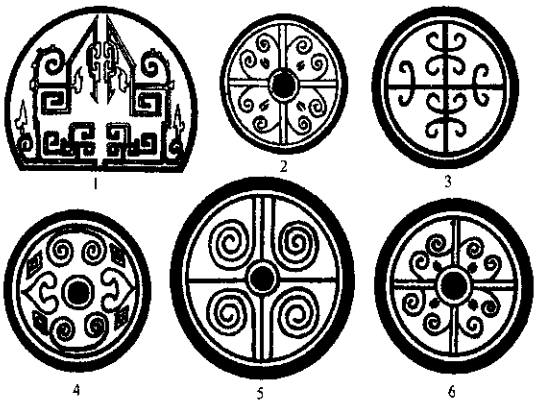


圖十　遼等級中石碑地秦行宮遺址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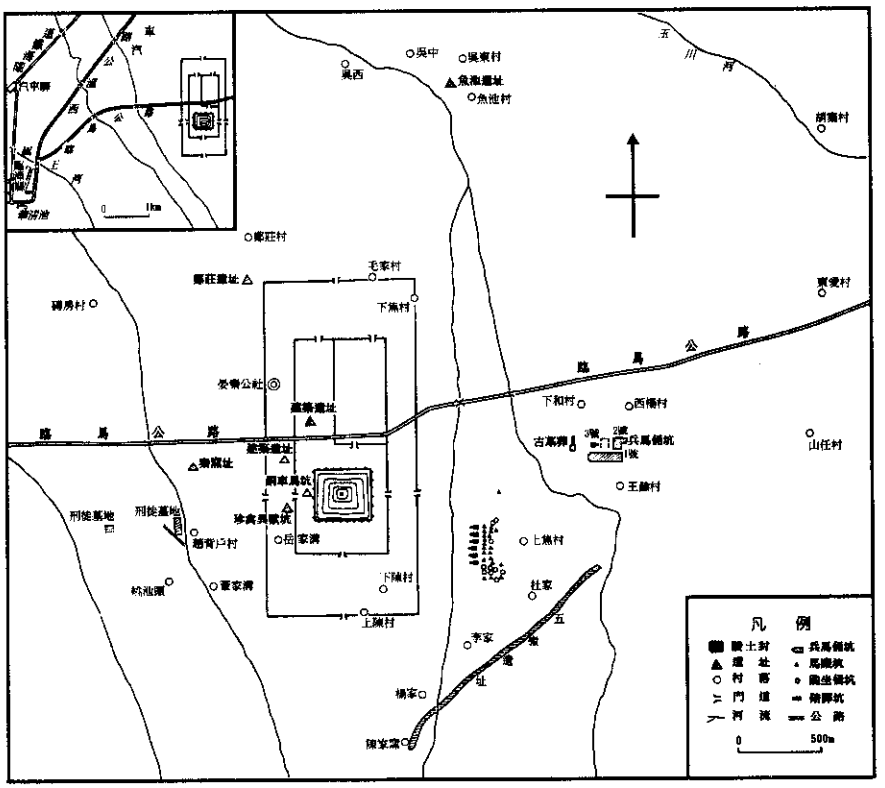


圖十一　石碑地秦行宮第III區二組建築遺址平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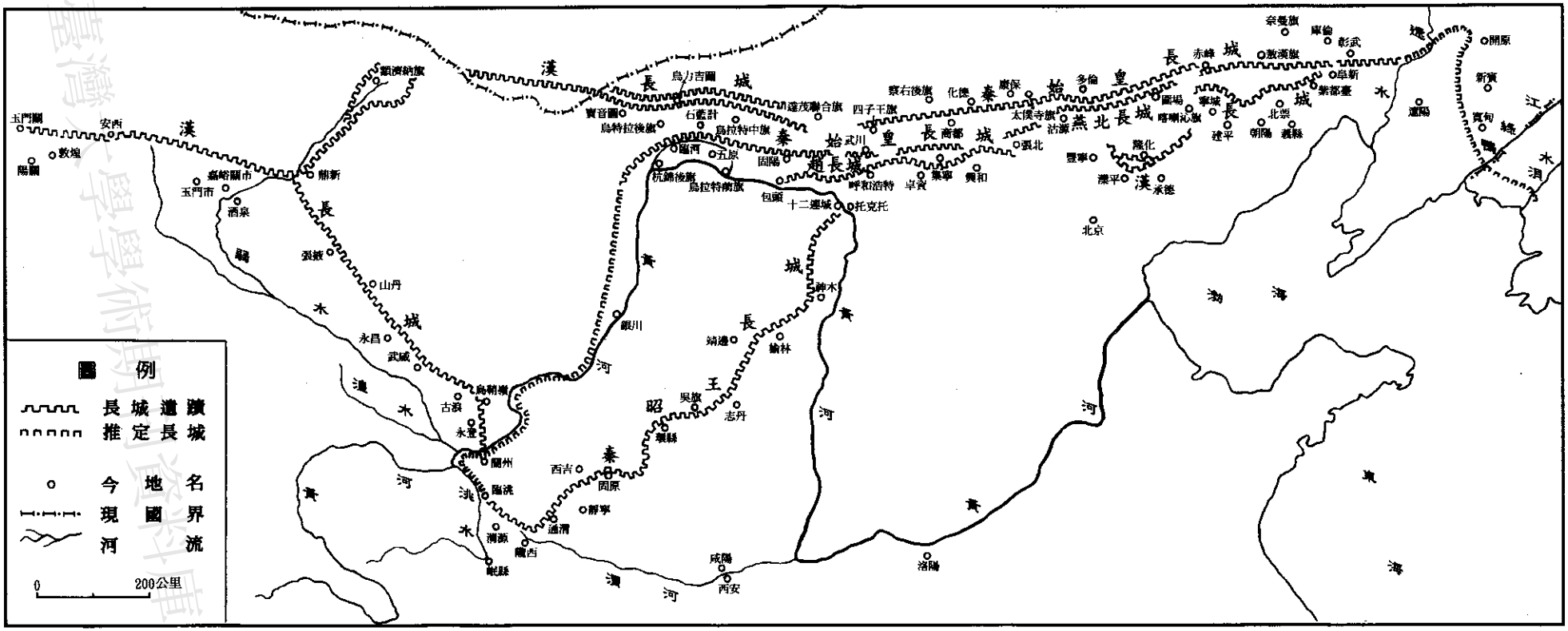
圖十二　石碑地遺址出土秦代瓦當



圖十三　秦始皇陵園平面示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四　秦漢長城遺跡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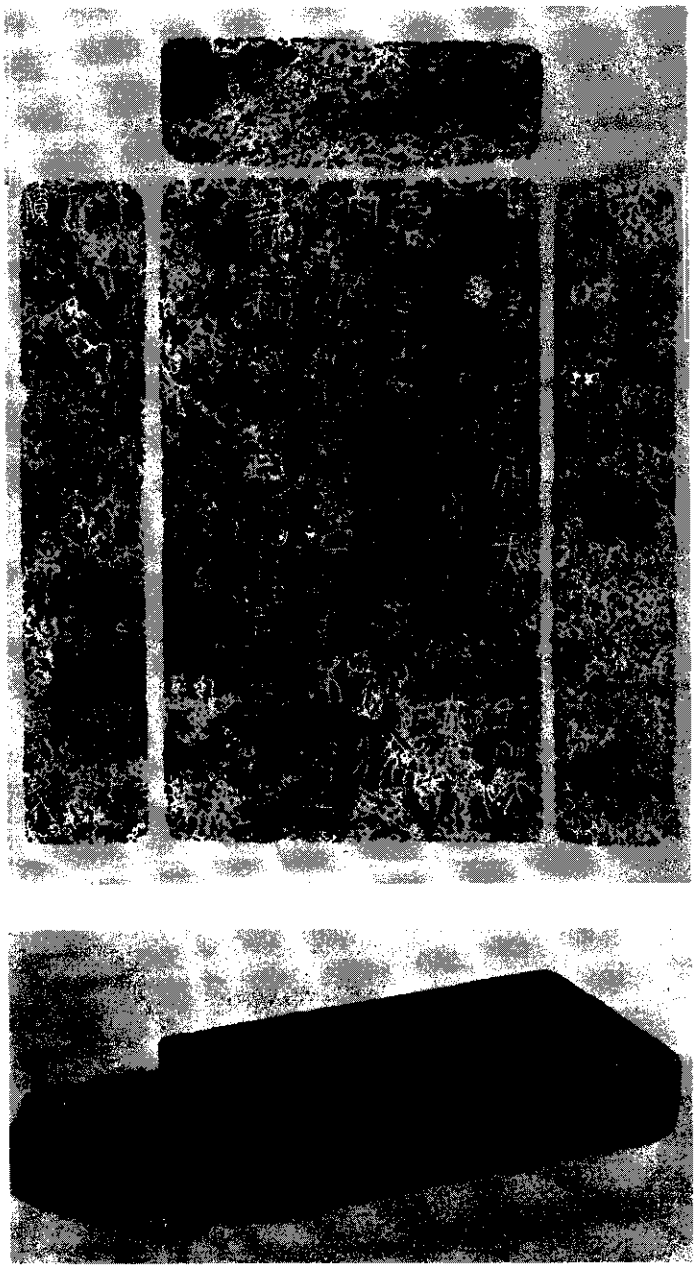
商鞅量（方升）銘文

左側：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爲升

端側：重泉

底側：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右側：臨



圖十五　秦商鞅量（方升）及詔書銘文拓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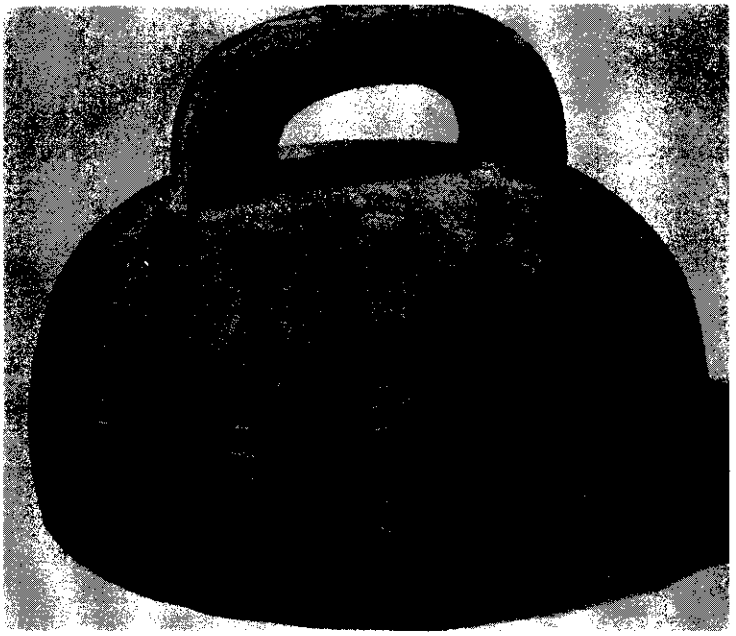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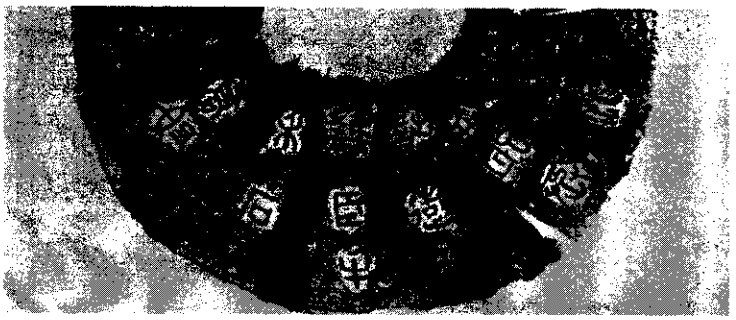


圖十六　秦始皇銅方升（量）及詔書銘文拓本

銘文：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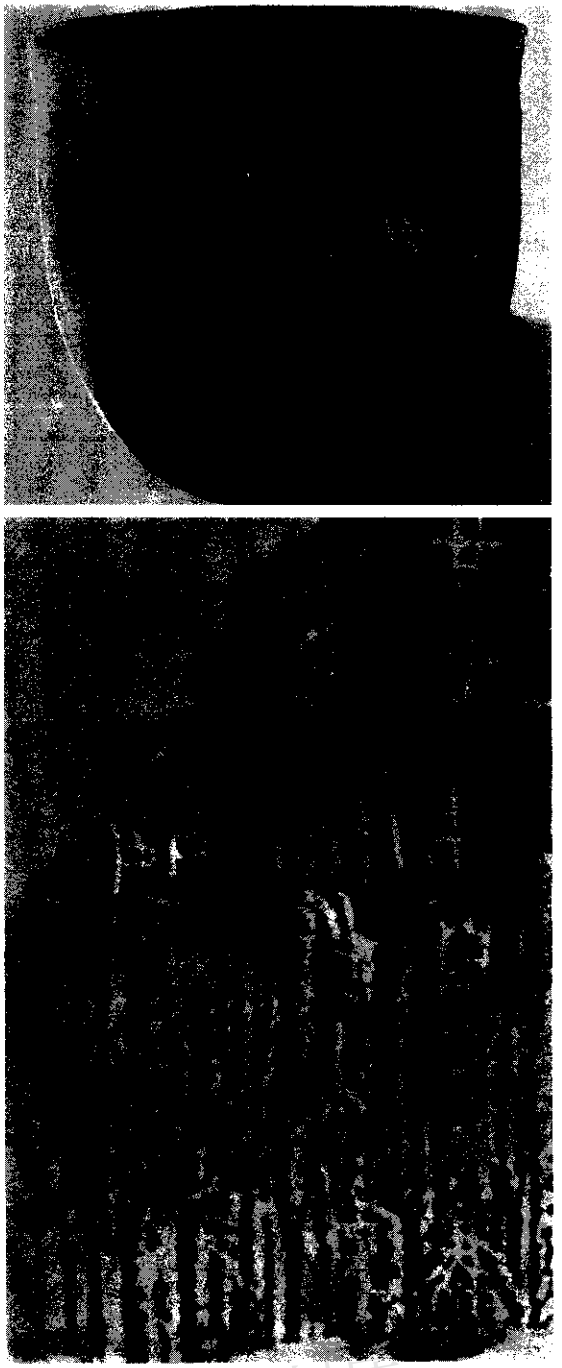
圖十七　西安阿房宮遺址出土的高奴禾石銅權及詔書拓本

正面銘文：三年漆工配丞詘造工隸臣牟禾石高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八　內蒙古赤峰發現的秦始皇詔書陶量

陶量殘銘：廿六年皇帝兼……諸侯黔首大安……詔丞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